

杜鲁门缘何屡拒蒋介石“出兵”朝鲜

林泓

摘要: 朝鲜战争期间, 蒋介石为确保台湾, 反攻大陆, 曾屡次向杜鲁门政府请求出兵朝鲜, 协助美国作战。然而杜鲁门为了避免引发美中、美苏冲突, 防止台湾“陷落”以及盟国分裂, 加上与蒋介石素有结怨, 对其军队的作用持有怀疑, 故对蒋介石屡次“出兵”请求均予以拒绝。

关键词: 杜鲁门; 拒绝; 蒋介石; 出兵; 朝鲜

朝鲜战争期间, 蒋介石为确保台湾, 反攻大陆, 曾三番五次向杜鲁门政府“请缨”出兵朝鲜, 协助美国作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从军事角度考虑, 极力主张“邀请”蒋介石军队赴朝“助战”。但杜鲁门权衡再三, 最后均婉言拒绝。直至朝鲜战争结束, 蒋介石也未能派一兵一卒赴朝参战。其缘由何在? 本文将从战后国际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台关系、杜鲁门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等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深入分析, 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避免美中、美苏冲突

杜鲁门政府以综观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远东朝鲜战争局势, 认为蒋军出兵可能导致美中冲突, 甚至美苏对抗, 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杜鲁门政府竭尽全力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中国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 不在亚洲; 对手是苏联, 不是中国。战后, 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 确立了以欧洲为重点, 以苏联为对手的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称霸全球这一目标, 美国必须全力保存它的有生力量, 用于加强欧洲的战略防御, 以遏制主要的敌人苏联, 而不愿把力量浪费在边缘地区。如果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 同中国的人力资源打消耗战, 势必会削弱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力量, “不仅将把欧洲暴露在苏联军队面前, 还可能在欧洲大陆美国兵力最薄弱的时候, 引来一场攻击。” [1] “一旦失去欧洲, 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北约组织就会解体, 美国就会遭到孤立。” [2] 再说, 纵使美国有庞大的兵力, 也无力既屯兵欧洲以威慑苏联, 又大规模用兵于朝鲜战争, 它难以在欧亚两线均衡部署军事。因而要确保欧洲, 就必须在亚洲实现战略退却, 收缩在朝鲜的兵力。“不能让朝鲜的行动扩大成为一场大战”, 否则将严重削弱其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因此, 朝鲜战争一爆发, 美国就急于使朝鲜战争局部化, 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中国发生交战。

同时美国也担心蒋军赴朝会招致苏联的介入, 从而扩大战争, 甚至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二战后, 美苏关系由战时的盟友变成仇敌, 美国控制了西欧, 苏联控制了东欧, 使欧洲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前沿阵地, 随即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 世界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坚持欧洲是战略重点, 欧洲仍是美苏争夺的主战场, 避免在亚洲朝鲜扩大战争, 与苏联发生冲突。杜鲁门认为, 苏联准备与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 而美国却还没有准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 因为战后美国军人大复员, 总兵力已减至不足 120 万, 而且在世界各地还要承担众多的防卫“义务”, 战线过长, 兵力过于分散, 调兵遣将只能削弱该地区的防御。所以每当就朝鲜战争问题做出决策时, 杜鲁门不忘警示大家: “做任何事情, 都不能为苏联人提供借口, 以致把自由国家都投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中去。” [5] 而麦克阿瑟却力邀蒋介石出兵援朝, 这岂不是为苏联的

介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杜鲁门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相反，苏联背地里倒是期望朝鲜战争的扩大，因为在这场冲突中，它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投入“一兵一卒”，而使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朝鲜遭到大量消耗，让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认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3]自己却可以养精蓄锐，坐收渔人之利，这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却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值得庆幸的是，杜鲁门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稳坐在克里姆林宫里。”他坚持“只要这些敌人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4]

美国人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担心使用蒋介石军队，很可能会招致中共出兵朝鲜或进攻台湾，从而引发同中国人的全面战争，而一旦中共参战，谁也不能保证苏联不会进攻欧洲。国务卿艾奇逊审时度势，坚决反对蒋介石军队赴朝参战。他说：蒋军赴朝，会招来中共在朝鲜或台湾的干预，甚至两面都来。[6]如果蒋介石军队一旦在朝鲜战场出现，中共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此打击蒋介石的军队，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台湾时蒋介石难以自卫。[7]1950年6月29日，在美国务会议上，他力排众议，再次反对蒋介石出兵。他强调6月28日中共声明不只是一种恫吓，而是他们打算出兵的前兆。“如果蒋介石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将使美国军深陷远东而不能自拔，甚至“失去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机会”。[8]杜鲁门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冀在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使朝鲜战争演变成中美战争，甚至美苏对抗，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恰恰力图避免与中共、苏联发生正面冲突。为此，杜鲁门一再告诫那位连连请求援兵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不能让蒋军赴朝参战，应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规模内，避免中美冲突，否则会极大地损害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鉴于此，尽管实际上朝鲜战局极其需要外部援助，但杜鲁门仍然表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介石入朝。这是杜鲁门拒绝蒋介石出兵的根本原因。

二、避免台湾“陷落”

台湾位于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中央，是这一岛屿防线的重要一环。在美国传统防御线上，台湾被视为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它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战略防御中极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虽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失去亚洲后便会破坏美国全球战略的平衡。为了不使自己在与苏联对抗中失去平衡，美国在亚洲对苏联采取战略防御姿态，试图通过对台湾的有限援助，保持台湾有限防御能力，以达到遏制苏联势力东扩，维护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地区的战略利益。若失去台湾，将使美国从阿留申群岛以下的西太平洋防线形成一个重大缺口，对美国的战略防御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台湾的战略价值在美国失去中国大陆之后显得尤其重要。若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及其附近岛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且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它物质的主要来源地，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将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美国军方得出结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以保证它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9]

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错误地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共将解放台湾都是在执行苏联全球战略方案。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美国所占领的日本将被南北夹攻，东南亚各反共国家将受到极大威胁，美国的西太平

洋防线将被折成几段，其在远东的防御圈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不仅将打击美国在亚洲部队的士气，而且还会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且不愿看到的。因此，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迅疾派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去保卫台湾，并对美国西太平洋海岛防御圈“重新划线”，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线。目的有二：一是使台湾成为“美国西太平洋门户的后卫”，充分发挥其在美国太平洋防御链条的作用。二是使它成为侵朝战争的“侧翼”，牵制朝鲜战场，以减轻联合国军压力，促使朝鲜战局朝有利于南朝鲜方向转化，改变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

考虑到台湾的安全与防务，杜鲁门政府坚决反对蒋军赴朝，因为使用蒋军只能为中共军队找到一个进攻台湾的口实，完全不符合美国“保台”政策基点。艾奇逊强调，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正是因为台湾是“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现在，“一方面是在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10]蒋介石军队一旦出兵赴朝，会削弱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共就会趁虚而入，解放台湾，美国将陷入两面作战，而美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两场局部战争，这样台湾陷落将不可避免。因此，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军事上考虑，蒋介石军队的任务只宜集中力量守护台湾，不宜越海出兵，“以免台湾之防务因而发生严重之威胁”[11]这样，既无助于朝鲜战争局势的转变，还可能导致台湾陷落，甚至危及太平洋防御体系和海上交通线，严重削弱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故杜鲁门给予拒绝。

三、避免盟国分裂

盟国对美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李奇微曾说，尽管盟国提供的兵力不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12]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盟国虽然一致同意干涉朝鲜，并派兵参加“联合国军”。但他们在对朝、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一直存在分歧。他们“把北京看作是潜在的朋友，可以在亚洲抵消苏联的力量。”[13]不愿把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扯在一起，不愿帮助美国“保护”台湾，更反对在朝鲜使用蒋介石军队。盟国认为蒋介石军队赴朝肯定会激怒中共，“增加和共产党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甚至还可能导致苏联的干涉，或中共进攻台湾，“其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战争”，盟国对将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甚至全球战争的可怕前景感到惶恐不安。其次“美国卷入亚洲的长期战争会威胁到保护欧洲大陆这一首要任务”，会有损于美国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有损于太平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利益，他们希望美国能集中精力，加强欧洲防务。再次会使美国“疏远其它亚洲国家”，破坏美国在亚洲的形象。[14]盟国担心使用蒋军，会使美国成为亚洲人心目中腐败政府的支持者，将破坏亚洲小国对它的信任，丧失其在亚洲国家的威信。

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尤其担心美国置欧洲于不顾，在亚洲大干一场，把战火扩及中国，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时损害他们在香港殖民地的利益。为此，英国首相艾德礼不辞辛劳赶赴美国与杜鲁门总统会晤，试图说服美国不要扩大战争，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途径。同时要求美国在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前，必须事先与英国协商。再说，英国为了保持在华经济利益，维护在香港的地位，于1950年1月6日率先承认新中国，同时宣布撤消其对蒋介石政权的外交承认。为了使刚建立起来的中英关系免于受到伤害，英国表示，“不能与台湾蒋军并肩作战”，如果接受蒋介石军队，那么英军将无法参加联合国军。此外，联合国军中有些国家已承认新中国，有些国家又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因

而都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加盟“联合国军”。

杜鲁门总统也深知如果一意孤行，势必违背盟国意愿，破坏西方军事联盟，影响联军协调作战，从而丧失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甚至危及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起用蒋军，无论从战术还是从战略角度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有一点表面上的价值，其“结果却会使我们陷于孤立并丧失我们在联合国中所拥有的在地位、领导和支持等方面的巨大好处。”[15]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不能不顾及盟国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英国的立场，因为英国是美国在二战时期最强有力的盟友，战后美国需借助英国巩固西欧共同防御战略。鉴于此，杜鲁门一再表示美国不会因朝鲜战争而放弃或削弱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同时也不想扩大战争，更不会接受蒋介石军队，保证和盟国步调一致。慑于盟国的压力，蒋介石多次出兵请求，均被杜鲁门总统一一拒绝。

四、怀疑蒋军作用

美国向来对蒋介石军队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军队士气低落、训练不良、不堪一击。那些被中共军队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决不比南韩李承晚军队强多少。使用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根本不值得，对扭转朝鲜战局也未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在朝鲜兵源紧缺，美国四处求援，但联合国会员国有兵可派或志愿派遣者寥寥无几，麦克阿瑟一再请求蒋军赴朝增援，蒋介石也一再向杜鲁门总统“请缨”，表示愿派一支 3.3 万人的精锐军队，帮助击退北朝鲜的武装进攻，并声称这些部队将“携带着中国自己手中所有的最优良的装备。台湾将派 C46 式运输机 20 架运输这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可以在 5 天之内准备就绪，候命待发。”[16]同时他还强调：他的军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17]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联合国军一败涂地，蒋介石又吹嘘，他的军队“能够制止中共对韩国之侵略”，“至少中共不能再在韩国发动任何新攻势。”同时还一再表示“联合国只要有迫切需求”，“决不推避责任”，一定派兵赴朝作战。[18]尽管蒋介石百般谄媚，跃跃欲试，麦克阿瑟声嘶力竭，呼吁援军，但均遭到美国的拒绝。

艾奇逊自始至终反对蒋军参战，他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想利用美国为它的军队“谋取新的武器和物资”，他严厉指出，“蒋介石最好的军队对于抗击北朝鲜的装甲部队没有多大用处。”[19]“这支部队是不可靠的，训练不善”，且新败之余，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也许他们尔后给你惹的麻烦较之他们能帮的忙可能更多。”三军参谋长也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尽管他自己说是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像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20]而且，使用既无空军，也无海军的蒋军，还需动用美国运输力量和后勤给养，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这些军队，即使赴朝，但“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21]这对讲究实效的美国人来说，根本不划算，倒不如用来支持自己的军队更为划算。杜鲁门更是气愤不已，他说：使用蒋介石部队“从来就一无用处”，“我们过去曾送去大约 35 亿美圆的物质，结果 500 万的蒋军却在北京和南京面向 30 万共军投降了，而共产党人又用那些美援物资把蒋介石及其部下赶出了中国大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声称：想派遣蒋介石部队赴朝助战，“无论如何我是不让这事发生的。”[22]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在朝鲜会有所作为。因为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蒋介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领袖，他领导的军队腐败、战斗力差、士气低

落，不堪一击。即使出兵朝鲜，但在事实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没准还破坏联合国军形象。因此杜鲁门自始至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五、不信任蒋介石

杜鲁门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厌恶蒋介石，主要原因是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内战，因自身的腐败无能而导致失败，令杜鲁门大失所望，也使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军事领导能力深表怀疑，以至心存芥蒂，不仅不同意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而且还规定美援要在美国顾问的严密监督下使用。蒋介石大为恼火，寻机报复，1948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认为共和党的杜威一定会比民主党的杜鲁门更加积极援助蒋介石政府，为了帮助慷慨的杜威竞选总统，蒋介石派陈立夫、孔祥熙等携巨款赴美，为杜威竞选四处奔走、出钱出力。杜鲁门在描述当时竞选情形时，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圆可花”。[23]他在获悉美国过去援助中国的钱款绝大部分都落入他们的口袋时，曾气愤地骂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每一个都该坐牢”。杜鲁门当选，决不会忘记蒋介石在其总统竞选中的所作所为。对于蒋介石又是致信又是派夫人的各种求援，杜鲁门不加理会，未予理睬。在他任期，始终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冷淡态度，甚至在蒋介石危难之际，杜鲁门还决定由原来的“扶蒋”政策改为“弃蒋”政策。一方面试图“换马”，寻找为美国所用的新的代理人，先是欲扶植“代总统”李宗仁；而后又鼓动当时主持台湾军政大权的陈诚自立；再后来是扶植有美国背景的孙立人。另一方面抛出落井下石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向全世界公开指责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其领袖无力应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已失去人民支持”。[24]把国民党的失败完全归咎于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愤慨，但考虑日后还要仰仗美国，故不敢声张，只能在日记里痛骂杜鲁门“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25]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虽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但他表示，第七舰队在那里的目的是防止这场战争扩大化，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七舰队就撤走。所以杜鲁门的真正目的是为美国的利益着想，避免蒋介石引火烧身，给美国找麻烦。他仍然严格限制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方面拒绝给蒋介石以新的援助，所提供的有限的援助仅是消极防止台湾沦陷，而非资助其反攻大陆，更不允许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另一方面迟迟不派大使赴任，只让一位一等秘书代理在台“使馆”馆务。杜鲁门表示，美国无意同蒋介石建立任何形式的密切关系，并成为当时国务院的既定政策。可见杜鲁门对蒋介石的猜疑是根深蒂固的，他既无意谋求和蒋介石的真正谅解，也无意利用蒋介石的军队。

蒋介石如此热衷于出兵，其目的昭然若揭，意欲拉美国下水，使其卷入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乘机反攻大陆，同时加强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由于杜鲁门最终识破蒋介石出兵用心，故给予拒绝。为了避免蒋介石“出兵”之事干扰朝鲜战争决策，杜鲁门最后以调整指挥权的名义，将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分开。为此，蒋介石对杜鲁门耿耿于怀，直言不讳指责他，“因为恐惧苏俄和姑息中共”而反对蒋军参战“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26]他认定：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其出兵愿望就永远无法实现。

虽然蒋介石处心积虑，屡次请求出兵被拒，但他仍是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美国的全面保护。杜鲁门虽说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但他从这场蒋介石“出兵”纷争中，逐渐意识到台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以至对台政策由“弃蒋”转为“援蒋”，加强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还明确表示要保护台湾，促使美国的盟

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是以其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参考文献：

- [1][3][4][5][13][美]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 邬国孚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82、283、283、282、200页.
- [2][12][21][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148-149、149、148页.
- [5][14]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第1卷.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518、429页.
- [6][15][19][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 上册.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277、330、277页.
- [7][10][20][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 第2卷.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第401、399-400、401页.
- [8]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0, 第7卷.第1606页.
- [9]资中筠, 何迪.美国对台政策机密档案.台北: 海峡评论社, 1992年版.第23页.
- [11][1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2辑上.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版.第123、102页.
- [17][25][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 第4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501、481页.
- [18]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 第3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年版.第3867-3868页.
- [22]黄安年.二十世纪美国史.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335页.
- [23]宋平.蒋介石生平.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498页.
- [2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1辑上.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版.第39页.
- [26]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 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年版.第398-399页.
- 作者简介: 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

(会议论文, 原文印发, 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